

中国图书馆学理论跨世纪的三次“重逢”与“莫比乌斯陷阱”

魏辅轶

摘 要 本文分析了张晓林和必浩、范并思和孟广均、程焕文和杜定友这六位学者的图书馆学理论思想在逻辑基础、历史渊源和社会影响方面的三次碰撞,以及 20 至 21 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发展中资源、服务和技术三个基本面代表性理论的三次“重逢”现象,即“知识服务”与“知识交流”学说的意外重逢,“图书馆 2.0”与“信息资源管理”在技术发展道路上的必然相遇,“资源为王”与“三要素”的主动相遇。提出:知识服务未能在图书馆落地的原因在于缺乏需求研究,以及过度的个人依赖导致缺乏可以复制的成功模式;“图书馆 2.0”运动是一场图书馆的去中心化运动,同时对图书馆人才产生了积极和消极影响;以“资源为王”为标志的寻根思潮的出现和兴起有其历史原因,但在发展中可能会遇到成本困难和理论质疑。通过时间线索的展示,提出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发展过程可能陷入了一种“莫比乌斯陷阱”,这是由理论之间的张力导致的连续反馈运动形成的。最后通过分析需求与资源、服务和技术逻辑关系得出结论:需求是联系三个基本面的核心因素,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只有通过需求研究将三个基本面锚定在一起,并形成理论的有序沿革与传承,才能突破“莫比乌斯陷阱”。参考文献 36。

关键词 图书馆学理论 知识交流 知识服务 图书馆 2.0 信息资源管理 要素说 文献资源 莫比乌斯
分类号 G250.1

Three “Reunions” Cross One Century and “Mobius Trap”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Theory

WEI Fuyi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henomenon of three “reunions” of the representative theories of resource, servi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theory from the 20th century to the 21st century. The study analyzes the three collisions of the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between Zhang Xiaolin and Mi Hao, Fan Bingsi and Meng Guangjun, Cheng Huanwen and Du Dingyou in terms of logical basis, historical origin and social influence.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studies the unexpected reunion of “knowledge service” and “knowledge exchange”, reflecting th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knowledge elements in library science by two scholars in different time and space. Secondly, it studies the inevitable meeting of “Library 2.0”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on the road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hirdly, it studies the active encounter of “Resource is king” and “three elem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study analyzes the reason why the knowledge service fails to be implemented in the library due to the lack of demand research and excessive personal dependenc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Web 2.0, it puts forward that “Library 2.0”

通信作者:魏辅轶,Email: weifuyi@tjpu.edu.cn,ORCID: 0000-0002-6065-0270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WEI Fuyi, Email: weifuyi@tjpu.edu.cn, ORCID: 0000-0002-6065-0270)

movement is a library decentralization movement, and analyze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Library 2.0” movement on library talent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historical reasons for the rise of the root seeking trend marked by “Resource is king” and analyzes the cost difficulties and theoretical doub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oot seeking trend. Through the display of time clue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theory may fall into a “Mobius trap”. In the trap,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riodic repetition, and the new theory lacks the necessary development space due to the reason of theoretical convergence. “Mobius trap” is formed by the continuous feedback motion formed by the tension between theories. Finall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and and resources, services and technology, it is concluded that demand is the core factor connecting the three fundamentals. If the three fundamentals are anchored together through demand research to form the orderly evolu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he theory, we can break through the “Mobius trap”. The innovation of this study is to show the development cycle of basic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from a higher time dimension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six important nodes in the cross century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This paper creatively puts forward the “Mobius trap” of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and points out the internal logical relationship among the three basic aspects of the basic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circulation phenomenon of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under this logical relationship. The conclusion is that demand is the core element of anchoring the three basic aspects of library science. The demand makes the resource, service and technology of library science theory research anchor each other.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break the “Mobius trap”. 36 refs.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theory. Knowledge communication. Knowledge service. Library 2.0.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Elements theory. Document resources. Mobius.

0 引言:中国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发展的核心问题

如果把1920年韦棣华女士与沈祖荣先生共同创办的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1]作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发端,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已经走过整整一个世纪。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图书馆从业者和图书馆学研究者始终都在试图解答两个问题:图书馆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图书馆学的研究本质对象是什么,这样两个看似通俗的问题其实暗含着有趣的推论。

图书馆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当这个问题出现在图书馆从业者脑海中的时刻,首先意味着

一种反思,而反思源于对现有图书馆工作内容的质疑。这种质疑大概可以分为内涵和外延两个层次。第一层是对现有工作本身价值的质疑:图书馆虽然有传统的工作内容,但这些内容的价值显然受到了挑战,图书馆需要建立新的理论,并从工作的内涵上重塑这些价值;第二层是对图书馆工作内容边界的质疑:这种质疑是在思考图书馆是否可以拓展现有工作的外延范围,从而将更多新的工作和责任纳入图书馆工作的范畴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思考图书馆工作发展的方向是什么。

图书馆学的研究本质对象是什么?当图书馆学科开始反问自己的研究内容时,这说明:第一,现有的研究者对图书馆学研究的对象还没有共识,或者共识在发展的过程中被意外打破,

而新的共识还未建立;第二,传统图书馆学与图书馆之间的关系受到了质疑,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之间出现了显著的分歧和裂痕,原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现在却可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中国图书馆学家从20世纪起就对这两个核心问题进行不懈的研究和讨论,进入21世纪后讨论尤为激烈。早期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直接提出自己的观点,在21世纪的讨论中不乏有一些激烈的争锋或者新颖观点,其中也可能包含对其他观点的批判^[2-6]或者继承^[7-10];另一类是观点的综述和评价^[11-17],希望从中发现理论研究的发展现状和特征。遗憾的是新的观点未能达到集体共识,观点的评述也多从不同研究方向上分类总结。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在21世纪初期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爆发之后又归于平静。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似乎经历着某种隐秘的周期性演进循环,而这种特征需要更宽阔的时间跨度才能表现出来。这种演进到底是一种曲折的进步还是周而复始的循环,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为何不能达成共识,新理论为何不能得到发展空间,不同理论之间又为何显得互相孤立。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梳理了进入21世纪后中国图书馆学核心思想的关键转折与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重要节点的三次“重逢”,站在更高的时间维度上梳理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发展的跨世纪的脉络演进,探究中国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发展之根本思想。

1 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跨世纪的三次“重逢”

1.1 “知识服务”与“知识交流”的重逢

1.1.1 2000年:张晓林

2000年张晓林在《中国图书馆学报》上发文《走向知识服务:寻找新世纪图书情报工作的生长点》,该文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具有非常明显的旗帜性特征。在这篇论文中,

张晓林为图书馆的发展构造了一个全新的愿景。

“长期以来,图书情报服务的主流是劳动密集性和资源依赖性工作,即使现在的自动化管理系统和网络化检索与流通系统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18]。张晓林看到了图书情报工作非专业性、技术性的特征与21世纪蓬勃发展的网络数字化技术及知识经济的专业知识化要求不能吻合的现状,传统的图书情报工作面临被淘汰的风险。这种预见无疑是正确的。

21世纪初期互联网技术正在全面发展,网络巨头崛起,数字化革命方兴未艾。那时图书馆的各项工作发展显然还没有来得及对这样的改变作出及时的反馈,图书馆以文献为主的传统服务形式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信息检索与传递走向非中介化、非专业化和非智力化,其在用户活动中的影响逐步边缘化。图书馆或者情报机构只有发展知识服务才是自我救赎式的出路。“我们的核心能力不在于所拥有的资源,而在于我们具备的利用广泛信息资源为用户创造价值的知识和能力”^[18]。张晓林从文献的概念跨越式地跳过了信息的概念,直接进入了知识服务的概念。现今知识内容服务商的蓬勃发展已经足够证明他的预见,唯一不同的是这种知识服务形式最好的发展形态并没出现在图书馆,图书馆的知识服务走上了另一条发展道路,即学科馆员制度。

学科馆员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篇文章的产物,并在后续很多年深深地影响了图书馆服务的发展。2000年之后,学科馆员制度开始逐步在一些高校图书馆建立,其中还有一些高校图书馆在理论上做出了改良,如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提出的IC²概念,实际上是学科馆员制度的一种改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据此理念开展的学科馆员服务使其成为此后若干年学科馆员服务的先锋。

张晓林虽然前瞻性地看到了知识服务的重要性,但很遗憾,他的理念在图书馆实践的过程中其实并没有完全依照预想的理想状态发展,

虽然他在文章中也提出了很多预想的知识服务的方式方法,然而这些方式方法对于还没有很多社会经济运作经验的图书馆来说显然难以快速领会和执行。国内除了几个著名高校图书馆和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外,其他学校和机构的学科馆员制度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即便是著名高校图书馆实施学科馆员制度效果好的情况也只能说是个别案例。最主要的原因一方面是缺乏对需求的研究,而掌握需求是知识服务成功的核心;另一方面是过多地依靠馆员个人的能力和素养,缺乏系统性的、可复制的服务模式。这些问题可能是跨越式发展留下的后遗症,学科馆员制度还需要时间去解决这些问题,但这篇文章当时确实彻底地转变了图书馆服务的发展方向,不仅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而且在这一理论的转弯处恰与另一位学者意外地“重逢”。

1.1.2 1988年:宓浩

如果将时间拉回到1988年,这一年46岁的宓浩出版了他人生第一本也是最后一本著作《图书馆学原理》。其中这样写道:“图书馆学要研究社会知识交流在图书馆活动中的过程和特殊规律;研究如何收集、整理、贮存和传递知识载体,以促进社会知识的交流。”^{[19]56} 党跃武教授这样评价这本著作:“《图书馆学原理》不是一本传统意义的图书馆学教材,而是向传统定势发起挑战的集理论专著与教材为一体的学术成果。”^[20]

宓浩的“知识交流说”从知识活动的角度阐释了图书馆作为知识交流环节和知识节点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 and 作用。这样的观点在当时以文献为研究核心的年代是非常超前的,也标志着“知识”明确作为研究对象被推上了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舞台。宓浩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论述了图书馆作为社会知识交流机构在知识交流的“输入”与“输出”过程中所扮演的知识传递的角色。“文献是一种知识载体,其输入输出都是以文献的知识内容的利用为其存在意义……因此就本质来说,图书馆是社会知识交流

的工具,是社会知识活动链中的一个环节”^{[19]220}。也许是因为宓浩英年早逝,以致学术思想未能充分开枝散叶,也许是因为他的理念过于前卫飘逸,以致在当时的时代节点很难找到实践的具体方式,又或是他的思想未能跳出文献概念的桎梏,正如卿家康评论所言:“从其理论出发点来看也并不十分准确,用‘文献信息交流’作为图书馆活动的本质认识似乎更为贴切。”^[21]在其身后的十几年中,知识交流的思想虽再无长足的发展和实践,但与张晓林的那次重逢却赋予了知识交流说新的内容。知识交流说的理论框架固然囊括万千社会知识活动,但其在图书馆实践中却难寻一入门小径。究其原因,知识是人类活动的智力抽象,这种抽象不能脱离具体的人的活动而独立存在。图书馆参与社会知识交流就必须与个体、其他社会组织形成模式化的连接。模式化就需要图书馆突破经济、制度和需求的障碍,进化出可以复制的服务操作模式,而这种模式正是张晓林所设想的一种理想情形。因此,知识服务无意中为知识交流探寻了一条通幽曲径。

不能说张晓林的文章就是宓浩思想的继承,而应该说两者在不同的时空下看到似乎同样的景色。不同的是宓浩先生看到了景色并将其描绘了出来,而张晓林看到了景色并努力地实现创造它。宓浩看到景色的维度更大,告诉我们图书馆在社会知识交流中的模样;张晓林则更力图寻找一条进入这个景色的道路,努力为图书馆嵌入社会知识服务探索入口。知识交流说的基因正是在知识服务的孕育中,在社会经济雨露的滋养下获得了又一次新生。

1.2 “图书馆2.0”与“信息资源管理”的重逢

1.2.1 2006年:范并思

在图书馆学的发展道路上,对技术的追求和期待一刻也没有停止过。21世纪本来就是一个属于技术的时代,图书馆在其中也不免受到技术浪潮的波及,希望在新世纪技术爆发的潮流中获得前进的动力。范并思在2006年发表的

论文《图书馆 2.0:构建新的图书馆服务》集中地反映了当时图书馆对技术的热情与渴望^[22]。

范并思说:“图书馆 2.0 是 Web2.0 在图书馆的应用,或者说是 Web2.0 的思想对人们研究与改进图书馆数字化服务的一种认识与思考。”^[22]即通过 Web 技术的嫁接和理论方法思考图书馆的发展。该篇文章从内容上看很多都是介绍图书馆 2.0 的由来或与 Web2.0 之间的技术关系,或者当时国外技术的一些进展,貌似并没有很多难懂的技术细节,也没有很高深的理论框架。但这篇论文的引用数量却高达 667 次(数据来源于 CNKI,截至 2020 年 5 月 6 日),在范并思发表的论文中名列第一。这种不寻常的引用数量说明,在进入 21 世纪的初期,中国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太渴望技术潮流之水来滋润了。图书馆 2.0 的提出给处于发展理念干涸状态的图书馆带来了新的希望,给万千图书馆员和研究者带来了新的研究空间,之后中国图书馆学界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图书馆 2.0 运动”。

图书馆 2.0 运动是一场草根的盛宴,是一场技术的朝圣。这场运动的标志用范并思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会’Web 2.0 和信息服务研讨会和‘一本书’《图书馆 2.0:升级你的服务》”^[23]。之所以说这是一场草根的盛宴,是因为图书馆 2.0 运动本质上是一场由 Web 2.0 技术驱动的运动。首先,Web 2.0 技术的本质就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思想体系,在这种去中心化思想转嫁到图书馆后,图书馆也就必然弱化了原有的权威体系,给了草根新人更多的施展空间。其次,在老一辈的权威学者中,大多并不是网络专业技术出身,更多的是正统图书馆学情报学培养的人才。Web 技术的发展也不同于原有信息系统式的 IT 技术,即便是专精于信息管理系统的情报学者也并不一定谙熟 Web 技术。这种人才的空白也给了广大草根学者扬名立业的机会。因此,图书馆 2.0 运动实际上是一场中国图书馆学去中心化的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权威与草根之间的界限,弱化了学术壁垒,将一

部分的学术话语权通过 Web 技术的通道转移到了年轻学者身上。

对这场运动后来的影响,范并思五年后在《纪念图书馆运动 2.0 五周年》中这样说:“图书馆 2.0 运动至少给我们留下两个方面的理论遗产:第一,图书馆 2.0 运动推动了网络图书馆学和草根们的研究进入或影响主流学术圈,从而改变了图书馆学的学术生态,为图书馆学的新发展带来动力;第二,图书馆 2.0 运动破除了人们对技术的神秘感,弥合了图书馆理念、信息技术、用户服务之间的鸿沟,改变了图书馆人对于资源、服务、技术的理解。”^[23]

这场运动无疑为图书馆学带来了新鲜的思想血液,但这场运动中产生的成果也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不乏一些蹭热点、找新奇的学术现象,这些更像是一种浮于表面的学术泡沫。在图书馆 2.0 运动后期,当大数据、云计算这些更为前卫和时尚的技术概念出现后,学界突然转向,在对图书馆 2.0 研究还没有进入深水区的时候,就拥抱了另一种技术。那一时期许多中国图书馆学研究者流行对更新更高深的技术概念的追捧,这些现象其实正投射出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软弱无力,因此,对于范并思提出的第二个理论遗产还需要辩证地看待。

时至今日,图书馆 2.0 运动虽已结束,但其余波依然不绝于耳。现在如 CALIS、上海图书馆等几个机构正在努力开发 FOLIO 系统,其数据管理的理念都可以在范并思 2006 年的论文中找到踪影。图书馆 2.0 发端于技术,在理论上搅得风生水起,又在实践中落得百转千回。如果说张晓林和宓浩的重逢是一场意外,那么范并思与孟广均的重逢却更像是一场旷世的约定。

1.2.2 1985 年:孟广均

1985 年孟广均在《关于情报概念、工程、信息业》^[24]中初步提出了“信息资源管理”的概念,后来他出版的《信息资源管理导论》成为了信息资源管理理论里程碑式的著作。孟广均主要以当时西方社会进入信息社会的大背景作为社会基础,“现在它们仍处于第五次信息革命之

中,将电脑和通讯结合起来即形成通常所说的联机情报系统”^[25],进一步将信息的控制与组织融入传统的理解,“没有控制、没有组织的信息,不再成为一种资料”^[25],最后再将管理方法和计算机技术作为手段,“管理方法和理论的演进是与新技术尤其是计算机技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使许多管理工作实现了自动化处理并都是以信息资源的开发与管理为主要内容,传统的管理开始演变为信息资源管理。”^[25]

之所以说图书馆 2.0 与信息资源管理的重逢在二十多年前就已有约定,主要的原因有三点。第一,两者在内核上都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内在动力体系。信息资源管理的技术内在动力来源于计算机技术的长足进步,图书馆 2.0 的动力则根源于 Web 交互技术的进步。两种技术处在同一发展脉络上的不同时空阶段。第二,两者核心理念都在于对信息的控制与管理。信息资源管理看重的是管理与使用的效益,图书馆 2.0 侧重于信息的分布管理与交互应用。第三,两者在与图书馆结合时都更强调技术理念,并不过分强调技术细节本身。信息资源管理在理念上是西方管理理念与技术的结合;范并思则表述得更直白:“Web2.0 所代表的实际就是一种创新精神”,“Web2.0 技术以用户为中心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它对以往技术的颠覆。而当图书馆人开始接触这种技术后,已认定它就是服务。”^[23]至此“图书馆 2.0”在图书馆人的眼中其实已经成为了“图书馆服务 2.0”。因此,图书馆 2.0 与信息资源管理的重逢是一场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

图书馆学虽然渴望技术进步带来的动力,但两次技术革命在经过图书馆学的发酵之后,其技术的“内脏”已经退化许多。图书馆 2.0 和信息资源管理都不谋而合地选择了技术理念的“躯壳”,填入图书馆学的肉身。这种看似华丽的蜕变却暗藏危机,如果图书馆学只能通过褪去旧的甲壳,寻找新的躯壳来获得生长空间,如此这般,即便一生解甲无数也只能落得流离失

所。如果图书馆不能夯实基础理论,从而完全摆脱对技术的依赖,如果图书馆依然将技术奉为发展的途径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这样的重逢也许在未来还会再次重演。这种重演背后的逻辑就是资源、服务和技术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三角关系,这就为第三次重逢留下了伏笔。

1.3 “资源为王”与“三要素”的重逢

1.3.1 2015 年:程焕文

在图书馆 2.0 运动时期,关于资源、服务与技术的争论就已经初见端倪,其间程焕文在博客上非正式地发表了自己对图书馆资源建设的一些看法,后来被整理为《资源为王、服务为妃、技术为婢》,直到 2015 年程焕文发表了《在“纸张崇拜”与“数字拥戴”之间——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困境与出路》,才正式将“资源为王”的想法予以阐释。

首先程焕文说:“数字资源相对于纸质资源的确具有许多优势,但这种优势不是一种‘替代关系’,而是一种‘优劣互补关系’。”^[26]紧接着悉数数字资源的六大困境,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数字资源交易中的困境,包括垄断、讹诈、壁垒和浪费四种;第二类是数字资源建设后果:同质化;第三类是读者的使用问题:阅读退化。最后他明确表示:“在信息资源日益同质化的今天,研究型大学图书馆依靠什么吸引学者,又依靠什么确立其学术地位?自然是‘人无我有’的特色纸本资源。”“如果没有资源,一切就无从谈起,所以‘资源为王’是图书馆的根本。”^[26]这两句话充分表达了他的核心观点:图书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纸本资源的收藏。图书馆需要从数字资源的重视回归到纸本文献的收藏建设,通过保持资源的原始性和异质性才能获得优势的地位。

从时间背景上看,程焕文的观点出现于图书馆 2.0 运动的末尾。对刚刚经历了草根欢庆和技术烟火洗礼后的中国图书馆而言,特别需要休整自己疲惫的身体,图书馆学也需要再次沉淀、凝结,重塑权威话语体系。在这样一个时

间节点上抛出回归纸本文献的观点,颇有点返璞归真的意味。纷乱的技术只是为我所用的工具,当一切归于原本,只有纸本文献才是真。似乎从一个纷繁迷乱的世界一下回到了静谧深邃的田园世界。“回归纸本”既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在时间上偶然恰如其分地切入了理论发展的真空地带,却也是此时中国图书馆学理论演进动力之下的必然。因此,“资源为王”这种要求回归纸本资源建设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流行也就不足为奇。

程焕文总结道:“图书馆学大师杜定友先生曾言‘图书馆应该收藏一切有文字的纸片’,我的名言是‘图书馆应该保存一切有文字的纸片’。这是图书馆的社会职能所在和历史使命所然,所有图书馆都应竭力为之。”^[26]至此,如果说第一次重逢是偶遇,第二次重逢是约定,那么第三次重逢就是必然。“资源为王”义无反顾地拥抱了“三要素”。

1.3.2 1932年:杜定友

杜定友1921年回国后在广东开始其图书馆事业的生涯,后虽然离开广东在上海从事图书馆学教育,但其间多次在两地辗转,并未真正远离广东,其职业生涯也在广州结束,并与中山大学图书馆和广东省图书馆渊源颇深。从这个意义上说,程焕文和杜定友相比算是广东的“后浪”学者,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这次重逢是必然的结果。

杜定友著名的三要素说是其学术思想的浓缩。1932年他在《图书馆管理方法新观点》中指出图书馆的理论基础是:书、人、法,三位一体^[27]。关于杜定友三要素说的解释已经有颇多的研究,这里还有必要提到和杜定友同期的另一位学者刘国钧。刘国钧在图书馆思想上是杜定友的继承者,他后来发展了杜定友的思想,相继提出了四要素说^[28]和五要素说^[29]。从内核上看,这几种要素说的思想基本相同,只是在外延表达元素上有不同的侧重。他们的理论都围绕图书馆本体展开,强调图书馆学与图书馆工作的密切联系。2019年程焕文专门撰文对刘

国钧和杜定友两位学者的思想进行了回溯和纪念^[30]。这次必然的重逢为图书馆带来了一场继图书馆2.0运动之后的“图书馆寻根思潮”。

图书馆寻根思潮可以简要地总结为:图书馆发展的内生动力来自于对文献的收藏;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图书馆本身;图书馆应该重视纸本文献的收集和保存,摆脱数字依赖和技术掣肘,依托资源优势获得发展优势。之所以说是“思潮”而不是“运动”,因为这种寻根的思想并没有被全面地接受,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数字文献的发展趋势依然强劲。纸本文献虽然也会长期共存,但要让大部分读者完全回归纸本也并不符合习惯。第二,图书馆回归纸本需要的技术基础并不具备。回归纸本并不是简单地增加纸本图书的数量和种类,如果仅仅是数量和种类的提升,那么这种回归实际上就是倒退。回归纸本实际上是要求图书馆具备选择能力,能从纷繁的文献中选择出满足读者需求的文献。但如何预测读者需求,如何测量需求的强弱,如何衡量文献利用的好坏,绝大多数图书馆显然还没有这个技术基础。第三,对于大多数中小图书馆来说,服务效果的重要性显然要大于永久收藏。虽然程焕文鼓励图书馆的特色收藏,所谓的“人无我有”说起来也很轻灵,但是文献收藏巨大的经济成本和时间跨度,却成为了很多图书馆的“不能承受之轻”。

在21世纪初期,张晓林和范并思在不同的时空不约而同地从服务和技术的角度给出了相似的解释。张晓林说:“仅仅在占有资源(尤其是垄断性占有)的基础上提供资源,虽然可迫使人接受其服务,但难以让人信服其服务的智力内涵和服务者的智力水平,而且这种资源上的‘不可或缺’一旦被打破,这种服务就会迅速丧失市场基础。”^[18]范并思指出:“在图书馆2.0环境下,资源不再是服务的必备前提,而图书馆的服务和技术却正在成为资源的来源。”^[23]资源、服务和技术三者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力量在钳制着彼此,让三者不能远离,这个有趣的问题

期待着一个探险式的解答。无论答案如何,寻根思潮面临着现实上的经济、习惯和技术三大障碍,未来发展之路并不是一条坦途。

2 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发展中的“莫比乌斯陷阱”

服务与服务的重逢,碰出了图书馆的社会化趋势;技术与技术的重逢,催生了图书馆学去中心化运动;资源与资源的重逢,萌发了图书馆寻根的思潮。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图书馆学似乎在不断地进步。但把这三次重逢的时间线拆开,却会看到不同的景象。

如果以 1932 年的“三要素”为起点,经过 1985 年“信息资源管理”、1988 年“知识交流”、2000 年“知识服务”、2006 年“图书馆 2.0”,至 2015 年的“资源为王”为终点,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图书馆学的理论发展在跨世纪的 83 年后似乎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循环形态。

这里不妨大胆地假设一下: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可能陷入了一个“莫比乌斯陷阱”。“莫比乌斯陷阱”的含义是理论发展走在了一个完全封闭的“莫比乌斯环”上,特点是:第一,理论整体发展形成了一个闭环。这种闭环的结构表明理论发展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重复特征,新理论突破的可能性较小。第二,理论之间的传承关系并不明确,除了寻根思潮的出现是主动的相遇,其余两种理论的相遇并没有表现出继承的特征,更多的是一种在不同时空和当时社会情景下突发的选择。寻根思潮的出现虽然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但还很难说是一种理论传承,更多的是在特定时间节点上的一种反思和回归。第三,新的思想和理论由于缺乏空间维度,不容易产生突破。最好的证明就是在 2002 年前后,中国图书馆学界发生了一次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讨论,马恒通^[31]、王子舟^[32]、柯平^[33]、龚蛟腾^[34]等诸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理论视角和新观点,可惜的是这些理论并没获得足够的发展空间,究其原因在于“环”内理

论循环的惯性很大。当有新的理论出现并试图突破“环”时,必然先遇到惯性的阻碍,但还没等到障碍的突破,循环惯性就会将其冲走,因为只有沿着“环”内方向运动的理论所受阻力最小。第四,理论发展很难进步,大多数理论只会在“环”上循环。由于莫比乌斯环是一种在不同时空位置形状扭曲的结构,不同理论之间的连接被时空天然地隔离开,有相似之处但缺少传承发展,这样就将理论发展牢牢地锁死在环内。图书馆理论的三次重逢是在这个循环中走到了环上同一位置的不同内面或者外面,但又很难看到彼此。只要这个环是封闭的,那么即使理论再怎么发展也不能逃出这个陷阱。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很可能就会在这个“莫比乌斯陷阱”中周而复始地经历着不同的重逢。

解决理论的突破问题对中国图书馆学发展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在“莫比乌斯陷阱”中,首先理论进步的速度很慢。因为这种循环其实是基础理论在不同场景和价值观下的应用,每一种理论的内核并没有明显的进步。其次,新理论突破的空间越来越小。理论的趋同性会形成强大、一致的社会惯性,跟随这种惯性很简单、也容易获得认同。而新理论从出现到成熟需要足够的时间和一批连续的研究者,更重要的是不能跟随潮流,需要自己站得住脚,而这一点对新理论的研究来说显得越来越难。最后,每次理论转化所付出的社会成本也会越来越大。因为随着理论应用的场景越来越具体,转换理论的跨度距离也就越来越大,图书馆学理论的每次转换就需要图书馆付出更大的社会成本。

3 资源、服务和技术三个基本面的张力

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要想跳出这个陷阱,首先需要了解这个陷阱形成的原因。本质上“莫比乌斯陷阱”形成的原因是图书馆学研究有三个基本面:资源、服务和技术,这三个基本面每一面都有独立的理论发展,但这三个基本面之间没有形成相互的理论关联。例如,可能

服务研究创新了服务的形式,但服务模式、方法与资源的属性结合的并不密切;或许技术研究侧重了算法或模型,但与具体服务对象的特征又不能很好地联系;资源的研究不免强调保存,但服务效果的后续评价和购买决策的科学依据却很欠缺。三个基本面的理论缺乏互相关联,彼此相对隔离,很容易造成在各自道路上盲目地奔跑。同时,学派、时空、价值观念在基本面上也会造成理论隔离,这种隔离如果不打破,也就没办法打破莫比乌斯的闭环。

那么,为什么单一基本面的力量无法突破陷阱呢?因为基本面之间张力的存在。程焕文“王”“妃”“婢”的比喻可能是对资源、服务和技术关系比较生动的表达,但是这种论述只是用一种层级关系将三个基本面串联起来,很显然是有其侧重的。这样的逻辑关系很显然是不能突破陷阱的,无非只是在圈内轮回的快一些,因为三个基本面过分强调任何一个面都会激起另外两个反馈的阻力。三个基本面像是用弹簧绑在一起的三个球,当一个球开始往前走的时候,就会被另外两个球拉住,最后,后面的球会因为拉力的反作用力迎头赶上,循环往复。从前文部分学者对“资源为王”的质疑中就可以看出,这种张力是明显存在的。

基本面之间张力的存在是理论发展的必然和基本规律,张力的存在使得三个基本面的理论之间的距离不能太远,但也不能形成统一的行动。张力的反馈需要时间,这也是为什么理论重逢需要一定的周期。突破陷阱显然不能靠理论的张力,三个基本面的理论之间要形成统一的行动,形成理论之间的连接,这就需要找到新的因素,这个因素必须有足够的能量将三个基本面锚定起来,发挥三者的合力。

4 需求:解开陷阱的钥匙

有什么因素可以将三个基本面牢牢地绑在一起呢?这就必须从图书馆学的底层逻辑中去寻找答案。这个基本的逻辑是:文献因需求而

有意义。

带着这个逻辑先去看资源。文献资源建设无论是纸本资源还是电子资源,保存绝对不是目的。即使文献资源再珍贵、再稀有,如果没有人需要,这些文献实际上相当于没有价值。图书馆保存文献的目的并不是收藏,而是保留未来某时某刻需要被满足的可能性。这样就有几个问题摆在图书馆面前,哪些文献未来被需要?读者需要哪些文献?现有文献利用的情况如何?资源建设不能离开这些问题来研究,不然就成了为了收藏而收藏。谁有钱谁就是王道,这个丛林法则对大多数中小图书馆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对他们来说,更大可能地满足现有的需求,比收集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用得上的文献显得重要的多。站在这一点上,满足需求和收藏文献,哪个价值更大并不能仅从文献存量上决定,效果和体验也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因为无论在任何时候,高效、经济地满足需求才是资源建设的核心。

再看服务。很明显图书馆服务的目的是满足读者需求。图书馆服务可以分为行政驱动型服务和非行政驱动型服务。所谓行政驱动型服务是指读者需求是由行政规定或者法律规章造成的,例如查新、查收查引、查重、学位论文收藏等。非行政驱动型服务是由读者自身需要产生的需求,例如借还书、阅览、查阅文献、文献传递等。图书馆在行政驱动型服务上取得的成效显著,因为需求明确且规律;而在非行政驱动型服务上却成绩平平,因为图书馆缺乏研究读者的需求,无法掌握需求的发生规律。例如,学科馆员服务是一种非行政驱动服务,那么图书馆必须对需求进行研究。科研人员的需求点在哪儿,在何时用何种方式介入科研?抑或科研创新本质上就是封闭的系统,并不适于主动服务。这些都需要进行前期的需求研究,而不是简单地想象研究者应该需要图书馆提供哪些服务。缺乏需求研究是学科馆员制度一直无法落地的原因,而商业知识服务则因充分地迎合了知识需求而获得了市场的认可。

最后看技术。技术本质上是为了提高效率或解决特定的问题而存在的。图书馆工作的技术应用也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面向馆员的技术发展,另一个是面向读者的技术发展。这就又出现了和服务类似的情景,图书馆在技术开发应用方面,面向馆员的技术发展比较成熟,例如CALIS的联机编目系统、查收查引系统,这些技术应用的目标对象就是馆员,主要由馆员使用,因为图书馆自身有明确的需求,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技术在图书馆应用中产生了效益。而面向读者的服务系统却大部分由商业公司开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图书馆对读者的需求没有深入的研究。由于缺乏对需求的研究,图书馆技术领域研究还表现出了对新潮技术不切实际的追捧,从大数据到云计算再到现在的区块链,这些技术在图书馆还没有找到需求应用场景的情况下,就被推上了研究的舞台。由于缺乏需求的根基,这样的技术研究很难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需求是可以将图书馆学理论三个基本面联系在一起的因素,是理论的“表面活性剂”。三个基本面之间其实没有轻重之分,只在研究的手段和途径方面存在区别。资源结合需求就有了意义,服务结合需求就有了目标,技术结合需求就有了效率。在图书馆学理论的三个基本面中加入需求的因素,先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释问题,最后解决问题,如此三个基本面的发展就被牢固地绑定到一起,降低了理论之间的张力,形成了一个统一而有力的理论系统。这个强大的理论系统避免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让图书馆学理论与图书馆的实际工作真正地结合在一起,把图书馆学研究 with 图书馆工作统一在一起,打破了图书馆学研究者与图书馆工作者之间的屏障,能够成为图书馆学发展的根本动力。

现如今,智慧图书馆的建设正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模型。智慧的含义不是保存,也不是自动,而是图书馆要从“我觉得你需要”转变为“我知道你需要”,“觉得”和“知道”之间的

巨大鸿沟就是对需求的探索。资源是智慧图书馆技术施展的基础,技术是图书馆服务的手段,服务是对需求的表达。当智慧图书馆的建设统一在需求这个框架下,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智慧”的图书馆。

5 结语

中国图书馆学和图书馆要彻底解决研究对象和发展方向问题,必须在基本理论上形成突破。但一方面,核心要素的缺失使得理论发展在理论的张力拉动下陷入“莫比乌斯陷阱”。理论的发展出现了在不同时空中的内核重复,纠缠于三个基本面之间的孰轻孰重,无法形成重要的突破,消耗了理论前进的动力。新理论很多仅仅是不同时空中理论的应用场景变化或对象的变化,“我国图书馆学对方法论的研究中,关于方法论的划分和对专门方法的确认,仍未跳出20世纪的框架,所谓‘创新’仅仅体现在方法划分的标准上以及专门方法的增加”^[35]。可以看出,理论的数量和种类的多少并不是理论进步的依据,理论还需有足够的解释力。另一方面,核心要素的缺乏还导致新理论的解释力不足。新理论的确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逻辑内部自治;第二,其推论必须有验证可能。“即使在使用脱胎于哲学的类比、比较、归纳、分析、综合、演绎等方法时,也需要基于可以反复验证的事实”^[36]。理论的推论需要可验证,这就要求推论具有一种有限的普适性,这种观测需要在相似的条件可以反复出现。推论在三个基本面产生的影响应该是联动性的,这样三个基本面就可以在特定的场景下锁定一个可以观测的重复结果。如果基本面不能联动,就会导致推论结果的不稳定状态,继而大大降低理论的解释力。因此,三个基本面的串联是提升理论解释力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需求是锚定图书馆学三个基本面的核心要素。需求使得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三个基本面(资源、服务、技术)之间协调和统一,理论之间

彼此锚定,当理论之间有了正常的沿革和传承, 陷阱”,进入自由宽阔的发展空间。中国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才能打破“莫比乌斯 学理论发展,未来可期。

参考文献

- [1] 程焕文. 跨越时空的图书馆精神——“三位一体”与“三维一体”的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2(5): 60-64. (Cheng Huanwen. Library spirit beyond space and time[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2(5): 60-64.)
- [2] 赵益民. 是“知识传播”还是“知识资源”?——就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与马恒通先生商榷[J]. 图书馆, 2009(1): 12-14, 48. (Zhao Yimin.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or “Knowledge resources”? Discuss the questions of the study object of library science with Mr. Ma Hengtong[J]. Library, 2009(1): 12-14, 48.)
- [3] 王淑华. 试论图书馆的本质与定义方法——兼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某些定义的不足[J]. 图书馆杂志, 2008(11): 6-9, 12. (Wang Shuhua. Thinking on the essence of library and its definition method; with discussions on some definitions of the object of library science[J]. Library Journal, 2008(11): 6-9, 12.)
- [4] 蒋鸿标. “结合说”不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兼与王睿、张开凤商榷[J]. 情报杂志, 2004(9): 129. (Jiang Hongbiao. “Combination viewpoint” is not the research object of library science; discussion with Wang Rui and Zhang Kaifeng[J].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2004(9): 129.)
- [5] 王睿, 张开凤. 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再思考——兼与王子舟先生商榷[J]. 情报杂志, 2003(5): 103-104. (Wang Rui, Zhang Kaifeng. Reconsideration on the research objects of library science; a discussion with Mr. Wang Zizhou[J].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2003(5): 103-104.)
- [6] 马恒通. “转化说”不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转化说: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新探讨》质疑[J]. 图书情报工作, 2001(7): 91-92. (Ma Hengtong. “On the theory of transform” is not an object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a query about *On the theory of transform; a new exploration to the object of library science* [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01(7): 91-92.)
- [7] 葛园园. 国内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知识流派”评析[J]. 图书情报工作, 2010, 54(11): 123-127. (Ge Yuanyuan. The comment and analysis on the “Knowledge genre” of the domestic library research object[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0, 54(11): 123-127.)
- [8] 吴海波, 黄立冬. 文献知识——图书馆学之本质研究对象[J]. 图书馆杂志, 2008(11): 10-12. (Wu Haibo, Huang Lidong. Literature knowledge: nature research object of library science[J]. Library Journal, 2008(11): 10-12.)
- [9] 陈源蒸. 关于“要素说”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纪念刘国钧先生逝世25周年[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6(4): 87-90. (Chen Yuanzheng. On the theory of “Elements” and objects of library science[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6(4): 87-90.)
- [10] 黄宗忠. 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定义、功能的新思考(上)[J]. 图书馆论坛, 2003(6): 4-12, 25. (Huang Zongzhong. New thinking on the object, definition and function of library science[J]. Library Tribune, 2003(6): 4-12, 25.)

- [11] 马恒通,高珉.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争鸣六十年——一个“非本质说”的视角[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0,28(4):31-36. (Ma Hengtong,Gao min. On the contention of study object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in the past 60 years;from the angle of “Nonessential Theory”[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2010,28(4):31-36.)
- [12] 吴慰慈.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走向[J].图书馆,2008(1):1,6. (Wu Weici. Research trends of the basic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J]. Library,2008(1):1,6.)
- [13] 涂湘波,韩继章.图书馆学理论 2006 年研究进展(续)[J].图书馆,2008(1):51-54,57. (Tu Xiangbo,Han Jizhang. A study progress of library science theory in 2006[J]. Library,2008(1):51-54,57.)
- [14] 黎晓晖,谢树芳.理论·实践,理念·问题——世纪初图书馆学研究的一些特征[J].图书馆,2007(2):43-45. (Li Xiaohui,Xie Shufang.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in early years of the 21st century [J]. Library,2007(2):43-45.)
- [15] 吴慰慈.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述评(1995—2004 年)[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5(2):15-19. (Wu Weici. A survey of theoretical researches in library science,1995-2004[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5(2):15-19.)
- [16] 熊伟.图书馆广义本体论导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体系的重建[J].图书与情报,2004(5):2-6. (Xiong Wei. Introduction for universality nonmenon theory of library[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2004(5):2-6.)
- [17] 盛小平.知识管理对现代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创新[J].图书情报工作,2003(9):51-56,66. (Sheng Xiaoping. Innovation made by knowledge management to the research objects of modern library science[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2003(9):51-56,66.)
- [18] 张晓林.走向知识服务:寻找新世纪图书情报工作的生长点[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5):32-37. (Zhang Xiaolin. Towards knowledge services;seeking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the 21st century[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2000(5):32-37.)
- [19] 宓浩,刘迅,黄纯元.图书馆学原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Mi Hao,Liu Xun,Huang Chunyuan. Principals of library science[M]. Shanghai: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1988.)
- [20] 文丰.重读宓浩[J].图书馆,1997(5):39-41. (Wen Feng. Appraisement on Mr. Mi Hao[J]. Library,1997(5):39-41.)
- [21] 卿家康.也谈图书馆学的研究方向——兼评几种现时流行的图书馆学理论[J].图书馆学通讯,1986(4):72-75. (Qing Jiakang. On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 library science;comments on several popular theories of library science[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1986(4):72-75.)
- [22] 范并思,胡小菁.图书馆2.0:构建新的图书馆服务[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6(1):2-7. (Fan Bingsi,Hu Xiaojing. Library 2.0;building the new library services[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2006(1):2-7.)
- [23] 范并思.纪念图书馆2.0运动五周年[J].图书情报研究,2011,4(4):21-24,20. (Fan Bingsi. The 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library 2.0 movement[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2011,4(4):21-24,20.)
- [24] 孟广均.关于情报概念、工程、信息业[J].情报业务研究,1985(1):26-27. (Meng Guangjun. On the concept of intelligence,engineering,information industry[J].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Science,1985(1):26-27.)
- [25] 孟广均.面对新的技术革命迎接信息时代到来[J].未来与发展,1984(1):33-35. (Meng Guangjun. Facing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welcoming the arrival of the information age[J]. Future and Development,

- 1984(1):33-35.)
- [26] 程焕文,黄梦琪.在“纸张崇拜”与“数字拥戴”之间——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困境与出路[J].图书馆论坛,2015,35(4):1-8.(Cheng Huanwen,Huang Mengqi. The way out of the dilemma of resourc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libraries in China[J]. Library Tribune,2015,35(4):1-8.)
- [27] 杜定友.图书馆管理方法上新观点[J].浙江图书馆月刊,1923(9):23-28.(Du Dingyou. New views on library management methods[J]. Monthly Journal of Zhejiang Library,1923(9):23-28.)
- [28] 刘国钧.图书馆学要旨[M].上海:中华书局,1934:11.(Liu Guojun. The main idea of library science[M]. Shanghai:Chung Hwa Book Co.,1934:11.)
- [29] 刘国钧.什么是图书馆学[J].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1957(1):1-5.(Liu Guojun. What is library science[J]. Library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1957(1):1-5.)
- [30] 程焕文.图书馆学就是关于图书馆的科学——谨以此文纪念李大钊130周年诞辰刘国钧120周年诞辰[J].图书馆杂志,2019,38(12):11-15.(Cheng Huanwen. Library science is the science about libraries;in commemoration of Li Dazhao's 130th birthday and Liu Guojun's 120th birthday[J]. Library Journal,2019,38(12):11-15.)
- [31] 马恒通.知识传播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新探[J].图书馆,2007(1):15-21.(Ma Hengtong. The knowledge communication theory:a new probe into the study object of library science[J]. Library,2007(1):15-21.)
- [32] 王子舟.知识集合初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索[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4):7-12.(Wang Zizhou. On knowledge set:exploring an object of library science[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2000(4):7-12.)
- [33] 柯平.知识资源论——关于知识资源管理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J].图书馆论坛,2004(6):58-63,113.(Ke Ping. Knowledge resources theory:on knowledge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the study object of library science[J]. Library Tribune,2004(6):58-63,113.)
- [34] 龚蛟腾,侯经川,文庭孝.公共知识管理学——关于图书馆学本质的思考[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3(6):2-6.(Gong Jiaoteng,Hou Jingchuan,Wen Tingxiao. The public knowledge management science:thoughts on the essence of library science[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2003(6):2-6.)
- [35] 黄红华,周佳贵.图书馆学理论的使命与担当——第六次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综述[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2,38(3):51-56.(Huang Honghua,Zhou Jiagui. The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library science theories:overview the 6th national seminar on fundamental theories in library science[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2012,38(3):51-56.)
- [36] 梁灿兴.透视图书馆学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争[J].图书馆论坛,2018,38(9):43-51.(Liang Canxing. An analysis of essentialism and anti-essentialism in library science[J]. Library Tribune,2018,38(9):43-51.)

魏辅轶 天津工业大学数字化图书馆研究中心馆员。天津 300387。

(收稿日期:2020-05-25;修回日期:2020-07-31)